

深度报道探胜

党报—主流媒体发展之路

中国文联出版社

刘海贵
主编

DANGBAO-ZHULIU MEITI FAZHAN ZHILU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理论创新”丛书

深度报道探胜

党报—主流媒体发展之路

复旦大学出版社

刘海贵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度报道探胜 党报—主流媒体发展之路/刘海贵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1

ISBN 978-7-309-05755-3

I. 深… II. 刘… III. 中国共产党-党报-新闻报道-研究
IV. G219.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0866 号

深度报道探胜 党报—主流媒体发展之路

刘海贵 主编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顾 潜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9

字 数 225 千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9-05755-3/G · 711

定 价 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理论创新丛书”编委会

主 任

张秉礼 童 兵

成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朱利民 刘海贵 李良荣 张松茂 张秉礼
赵 凯 赵晓亮 姚志明 徐 正 童 兵

编务统筹

金君俐

本书编委会

主 编 刘海贵

副主编 刘洪久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芳 吴 辉 吴华清

唐慧卿 董媛媛

总 序

张秉礼

经过多位专家及课题组成员的共同努力,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理论创新丛书即将陆续面世。正如当初所设想的那样,这套丛书既体现了学界对新闻传播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注,同时也反映了业界对理论创新的不懈追求。作为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推动产学研结合的研究成果,丛书的出版,将对报业集团各方面工作产生积极影响,也希望它们能够对我国报业的改革和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为了适应传媒事业进步和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更好地开展有关新闻理论与实践、舆论导向和新闻竞争战略研究,2006年,全国媒体中首家非编制性的新闻研究机构——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成立,并聘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主任、博士生导师童兵,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良荣,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凯,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新闻与传播学新闻业务方向首席专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海贵,分别任研究所的所长、特聘研究员。研究所成立后,很快确立了首批课题,组建了由以上专家分别挂帅,集团总编、副总编担任副组长,集团的业务骨干以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青年教师、部分博士研究生为成员的课题组。这批课题围绕报纸产品的读者情况、报纸内容

2 深度报道探胜

如何创新、报纸业务整体发展策略等重大实际问题而展开,其目的是为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新闻业务的发展、集团产业结构提升提供理论支持与战略指导,并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来探寻我国报业发展的未来之路。

众所周知,在传媒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中,报业的生存和发展正面临严峻的挑战,而应对挑战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通过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来提升报业自身发展的软实力。近年来,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不断深化体制改革,充分挖掘发展潜能,各方面事业蓬勃发展,综合实力明显提高。为了及时总结和提升发展经验,创新发展观念,破解发展难题,集团广泛开展科研协作,多方寻求智力支持,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智库机制。“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理论创新丛书”的出版,标志着集团的理论创新工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也反映了集团的智库机制已初见成效。由于凝聚了全国许多学者精英的智慧,丛书很好地对我国报业发展中的各项创新经验加以理性升华,不仅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而且站在了学术前沿,从而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相信丛书收入的论著,绝不只是将对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指导,而且会对全国同行也颇具启发意义。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理论创新丛书”的出版,凝聚了课题组所有成员的智慧 and 汗水。在课题执行和丛书撰写过程中,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师生们经常是不辞辛劳,奔波于沪甬两地,为课题研究的顺利展开和丛书的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参与课题研究和丛书撰写工作的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的部分领导和业务骨干,不顾日常新闻业务工作的繁重压力,积极投身相关研究工作,凭借丰富的实践经验给课题研究带来了活力和保障。在丛书出版之际,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祝贺。

是为序。

为报业集团的持续科学发展 寻求理论支持

——写在“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理论创新丛书”
首批学术成果付梓之际

童 兵

在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首批学术研究成果付梓出版之际,集团领导嘱我为此写几个字,我欣然应允。

一年前,当集团社长张秉礼先生告诉我,他们将成立新闻研究所并想聘我担任首任所长。我当时的心情是:既惊愕,又佩服。

我国建有新闻研究所(室)的传媒集团不少,这些传媒集团属下的新闻研究所的功能大致是:从传媒发表的新闻作品(节目)中评好稿,作为考级评聘的依据;收集资料,编撰集团及媒介史;为主要领导参加各地举办的研讨会和集团参加各种评审活动撰写论文和材料。正正式式地搞理论研究,严格按学术规范运作的研究所不多,而宁波日报报业集团规划建立和运作的正是后面这种正儿八经、名副其实的新闻研究所。正是出于对这样一种认真、严肃的办所动机的尊重,我决定试一试。同时说服我接受他们聘请的还有经常响彻在耳畔的恩格斯的一句话: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些年,我深为新闻界某些人的浮躁骄纵、不能居安思危的浅薄担忧和痛苦,而宁波日报报业集团 in 盛名之下,声誉和效益日增的形势下却谋求科学的可持续

发展,尤其是试图在按规律办报上有一个根本的理论上的腾飞,的确令人钦佩不已。作为学者,理应施以援手。再说,当前媒介生态和新闻改革变动不居,态势云谲波诡,参加研究所的工作,正好为自己找到一个了解改革、认识改革、参与改革的平台。

一年来,新闻研究所的正常运作和首批成果的问世,证实了集团规划和自己思考的正确。新闻研究所第一批立项的课题,诸如沿海城市党报的现状和发展谋略、新闻精品生产和深度报道的突破、受众对报业市场的影响等,不仅对宁波日报这样一些副省级城市报业集团的发展有着紧迫的现实意义,而且对探索新时期报业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可以说,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已经趟开了一条探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路子,对于有规模的传媒集团有着一定的普遍意义。

由于集团领导的坚持,张社长的以身作则和广大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我们在新闻研究所实行的一套学术研究方法是规范的、有效的。首批四个项目都经过专家论证和集团领导讨论通过,集团和新闻研究所以及相关课题负责人都签署了合同。课题实行学校教授和集团分管业务工作的领导双负责人制。课题组成员既有学校的教师和研究生,也有报社领导、记者和编辑。到报社外面进行读者和市场调研,集团分管领导也主动参加。这样,高校里通行的一套较为成熟的学术研究的技术理路和操作机制带进了报业集团,学校师生也从报业集团采编人员和管理干部那里学到许多学校无法得到的知识、信息和技能。这种产学研紧密结合的科研方法,相信今后无论对报业集团还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都是大有裨益的。这种收益首先不在写出几本书,而主要在于集团和学校双方的互动和互补所形成的体制和机制,在过去是不可能形成与运作的。正是这种体制和机制,才有可能既出成果又出人才。

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有一个好的领导团队,这个团队有一个好的班长。每次见到张社长,除了介绍集团近

期的工作,他最感兴趣的是同我们讨论种种时政与理论问题。我见到过一些媒体老总,他们也关注理论动向,但像张社长这样关注得如此广泛、如此深入的实不多见。这也许同他来自高校,曾在高校任教和担任领导职务有关,但据我看主要还是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和对集团今后的可持续发展的思考。每次同张社长的深谈总让我坚定这样一种信念:一个单位有这样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掌舵,是这个单位员工的福气。

至于对即将出版的首批学术成果的内容及评价,我不想说什么多余的话,每本书的主编——课题负责人会在书里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我想,集团领导已经在考虑第二批项目的选题事宜了。我作为所长,自然也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设想。期待第二批选题会有新的突破和拓展,会对集团今后的发展有新的贡献。

序

刘海贵

有人说：“报业已进入了‘冬天’。”

有人说：“报业已从‘黄金时代’、‘白银时代’进入了‘黑铁时代’。”

更有人说：“世界报业的消亡是迟早的事。”

经过认真、反复的调研和审视，我们却要说：“上述结论偏颇，不科学，‘冬天’过去了，‘春天’还远吗？中国乃至世界报业又一个‘春天’必将来临，毋庸置疑。”

确实，从20世纪的最后10年至今，面对新媒体的挑战，面对日益复杂的媒介生存环境和日益剧烈的媒体竞争趋势，报业所有同仁始终在思索着报业的未来。我们清醒地看到并承认这样的不争事实，即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崛起，报纸读者曾一度出现大量流失的现象。但时至今日，我们又欣喜地看到，流失的势头消止了，许多流失的读者又回来了，逐渐增多的青少年和城镇外来务工人员等人群壮大了读者队伍。这说明了什么？答案很清楚：新媒体的涌现固然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进步，并在一定程度上对老媒体产生冲击，但新媒体的出现决不意味着老媒体的消亡。这是因为，老媒体生存了几十年乃至几百年，早已形成了自身生存、发展的规律，有其自身的传播手段、特色、风格和对象，更有其早已在受众心目中建立的公信度、亲和力和权威性。况且，新媒体的出现虽然对老媒体的生存提

2 深度报道探胜

出了挑战,但同时也带来了机遇,一则是老媒体会痛定思痛,锐意改革;二则是会借新媒体的长处(主要是技术层面上的)来弥补自己的短处,从而开辟出自身一片新的生存、发展空间。

长时期的新闻传播实践证明,包括党报在内的报纸的生命力在于读者对它们报道内容和质量的认同,而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则是深度报道的成功运作。

诚如众多专家所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使中国报业从“解气”、“解闷”阶段跃入“解惑”阶段;或者说已从“政论报纸”、“报道报纸”跃入“解说报纸”阶段,受众对新闻信息的需求早已从想知道“什么”进入到想知道“为什么”、“怎么样”。处于剧烈转型期的中国,“解惑”、“解说”类的报道需求日益增大,那么,深度报道的进一步时兴,并由此推动中国报业健康、有序、积极的发展,进而带来报业发展的又一个春天,便属题中应有之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深度报道以前是、今后仍将是包括党报等主流媒体在内的中国报业的安身立命之所在。对这个趋势的认定,我们应当充满自信。

我们选择《宁波日报》作为课题研究和本书个案阐发的主要对象,是因为该报在全国副省级城市党报和地市级党报中具有代表性,且该报近10年来非常重视深度报道在党报生存、发展中的地位,并在持之以恒的实践中创出特色。《宁波日报》在深度报道中从无到有,从无序到有序,遇到无数次的挫折与困惑,又无数次地奋勇前行并取得成效,使深度报道着实展现并代表了一种良好积极的报道整体的发展态势。

深度报道是党报及主流媒体天生的生命使然,是党报及主流媒体的优势所在,是党报及主流媒体在媒体激烈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的法宝。这是我们研究这一课题的价值追求,也应成为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的共识。

2007年夏于复旦

目 录

总序	张秉礼	1
为报业集团的持续科学发展寻求理论支持	童 兵	1
序	刘海贵	1
第一章 深度报道的起源与历史演进		1
第一节 深度报道在西方的起源		1
第二节 深度报道在西方的现状		6
第三节 深度报道在中国的起源		15
第四节 深度报道在中国的现状		22
第五节 中西方深度报道的差异		34
第二章 深度报道的界定、特点与分类		40
第一节 深度报道的界定		40
第二节 深度报道的特点		48
第三节 深度报道的分类		63
第三章 网络时代党报深度报道的定位、作用与特点		75
第一节 网络时代党报深度报道的定位		77
第二节 网络时代党报深度报道的作用		93
第三节 网络时代党报深度报道的特点		110

2 深度报道探胜

第四章 党报深度报道运作的内外部条件	126
第一节 党报深度报道运作的优劣势分析	126
第二节 党报深度报道运作的机制探索	148
第三节 党报深度报道人才素质的特殊要求	178
 第五章 党报-主流媒体深度报道的前景展望	 187
第一节 党报-主流媒体深度报道的趋向分析	189
第二节 党报-主流媒体深度报道发展的若干思考	203
 第六章 个案分析——以《宁波日报》为例	 223
第一节 深度报道在《宁波日报》的地位	223
第二节 《宁波日报》深度报道的风格与特色	237
第三节 《宁波日报》深度报道的运作机制	251
 参考书目	 266
 后记	 271

第一章

深度报道的起源与历史演进

第一节 深度报道在西方的起源

深度报道(In-depth Reporting)这一概念起源于西方新闻界,其中调查性报道(Investigative Reporting)和解释性报道(Interpretative Reporting)是其最重要的两种报道形式。

一、调查性报道在美国的发轫

在美国,调查性报道滥觞于20世纪初的黑幕揭发运动。1902年底,《麦克卢尔》杂志发表的3组重要报道——林肯·斯蒂芬斯写的《城市的耻辱》、艾达·塔贝尔写的《美孚石油公司的历史》和雷·斯坦纳德·贝克写的《工作的权利》——标志着美国新闻界揭露丑行报道的开始。从1902年至1914年,美国报纸发表了大量调查性报道,集中揭发美国社会腐败现象,被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称为“扒粪者”。

这场黑幕揭发运动无疑为美国调查性报道发出第一声呐喊并拉开了声势浩大的序幕,学者展江对此曾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认

2 深度报道探胜

为,黑幕揭发运动是“由美国杂志新闻事业发起的一场揭露社会转型期大量出现的社会弊病的社会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由一批立志改革的社会精英撰写和创作的新闻与文学作品,广泛揭露了社会转型的副产品——官商勾结、贫富悬殊、假货泛滥这类社会丑恶现象,使20世纪第一个10年成了大声疾呼改革的时代,从反面帮助了一个民族重新发现了它的良知”^①。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黑幕揭发者,如林肯·斯蒂芬斯、艾达·塔贝尔、威尔·欧文、戴维·菲利普斯等。他们把“扒粪者”当作无限光荣的头衔,以能够揭露社会真相而自豪,尽管他们的作品中尚带有较大的主观色彩,与成熟完备的调查性报道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

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的调查性报道又一次达到了巅峰状态。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对“水门事件”的调查性报道,直接导致了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的被迫辞职,调查性报道的威力可见一斑。此外,还有很多调查性报道记者名噪一时,如拉尔夫·纳德、西摩·赫什、杰克·安德森、德鲁·皮尔逊等。这些新闻记者“挖掘报道了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卡车司机工会、犯罪集团和腐败政客的问题”^②,他们为调查性报道的日臻完善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一时期的调查性报道已经是建立在客观性基础之上的,是经过记者长期、艰苦的调查,充分挖掘事实真相、剖析问题的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调查性报道。为了使这种调查性报道理念得到传承和发扬,1975年,美国成立了调查性报道记者与编辑协会(Investigative Reporter and Editors, Inc.),调查性报道从此正式确立了它在新闻界的地位。

① 展江:《惊天动地的改革呐喊》,译序,展江、万胜(主译):《新闻与揭丑: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1),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1页。

② 刘明华:《西方新闻采访与写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05页。

二、解释性报道的诞生和发展

解释性报道的诞生和发展则有着与调查性报道不尽相同的时代背景。一直以来,西方新闻界严格奉行客观性的报道原则,甚至把客观性内化为记者的职业理念,以“倒金字塔”式为代表的写作形式被奉为新闻报道的经典样式,所有新闻从业人员都视客观、中立、不带感情色彩的报道为最高标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两次大的社会危机先后来临,给美国新闻界带来了巨大的震动。

这两次社会危机分别是1919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它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让世人感到猝不及防,没有半点预示似地突然发生了。事实上,当时的记者队伍中有相关方面的专家,是可以就观察到的前兆性的社会现象进行解释和分析的。然而,客观性原则要求记者只是原原本本地记录发生的事实,对这些事实背后的意义和联系却不容置喙,这才造成了危机“突如其来”的假象。美国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说道:“各种事件接踵而至,而这些事件本身似乎是毫无意义的。于是,一个‘为什么’变得与‘是什么’同样重要的时代开始了。当时,如果驻白宫的记者仅仅报道发生了什么而没有提供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含义,那他只完成了一半工作。”^①西方社会危机的惨痛教训促使新闻界人士不得不开始反思,纯粹客观的事实报道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前,是否缺失了社会感应器的现实功能?

1923年,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时代》(*Times*)创刊,该杂志的创办人亨利·劳斯(Herry Lowes)在消息深加工和新闻背景介绍上下工夫,并将新闻分为快新闻与慢新闻两种,类似于今天的动态消息和深度报道。亨利·劳斯自称《时代》是“新闻事件的注释

^① 转引自李良荣:《西方新闻事业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1页。